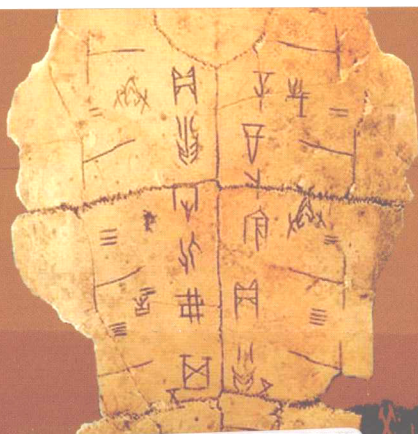


WENZIXUE CHULUN

文字学刍论

向光忠 著



商務印書館

文字学刍论

向光忠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学刍论 / 向光忠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8348 - 5

I. 文… II. 向… III. 汉字—文字学—研究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862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WÉNZÌXUÉ CHÚLÙN

文字学刍论

向光忠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348 - 5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½

定价: 35.00 元

序 文

龚序——汉字研究的历史探索

在汉语文字学的研究中，向光忠先生对传统文字学、古文字学、现代汉字学和汉字文化学中的诸多基本问题，探源析流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多有创获，在汉字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历史的探索。

向光忠先生依循“六书”学说的本旨，注重把握汉字的固有性能，长期坚持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汉字的孳乳规律。在1980年代开展的那场关于汉字的性质、功能和前途的学术讨论中，他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六书’之属，或是直接按‘以形示义’造成的，或是逐渐向‘以形示义’演化的。‘依类象形’而摹画出‘文’，固然是为‘以形示义’所制约；‘形声相益’而孳乳出‘字’，也莫不受‘以形示义’的作用。由此看来，‘以形示义’是汉字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认识其实就是向先生多年研究汉字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路。

汉字是一种以单音节语素为单位据义构形单音成字并系统保持形义对应的自源文字。据义构形以形示义既是汉字的命脉，也是汉字的特色。以形示义作为汉字的命脉是与生俱来的，这不仅在于汉字因源于记事的图画而选择和发展了据义构形的造字方式，而且在于汉字为适应汉语语素单音节化的特性而选择和坚持了单音成字，即文以记言的层级是有义有音的单音节语素。以

2 文字学刍论

形示义作为汉字的特色是自我完善的,这不仅在于自源的汉字几千年来从未间断与突变,从而使据义构形的基本字——字根在甲金篆隶楷中得以递相对应传承,而且在于表意的基本手段由单个的取象表意逐步发展而为系统的分部类从,正是基础字根的分类符化使汉字表意的基本方式升华为了字族的类联系。诚如向先生所论,“‘以形示义’是汉字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记录汉语的汉字连绵不断数千年至今仍然生机勃勃,唐兰先生认为汉字是研究人类文字的发生和发展的一座宝库¹。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向光忠先生努力运用文字生成学的理论,坚持结合汉语来研究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为了“寻求初文衍生新字的线索”,他“将文字孳乳与语词滋生相联系,沿着语词衍义而文字衍形与语词衍音而文字衍声的途径进行辨察”,对会意、形声、转注的历史成因、创制原理和繁衍轨迹逐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努力去揭示汉字“字根增殖而字族蕃息”的孳乳历史与发展规律,其中关于形声溯源的研究成果尤为学术界所关注。

汉字是一个先象形以画文后孳乳而组字的有理性符号系统。汉字的字种特多而字形复杂,但构字的字符有限且构字的方式有逻辑性。基本字符相对集中而以文组字合成有理,是汉字的逻辑构字规律。汉语语素单音节化的本质属性,致使汉字选择和坚持了据义构形单音成字,表意化单音化是汉字记词方式的基本历史走向。研究汉字的孳乳,既需由字根而字族以探析汉字如何发展的源流谱系,亦应由汉语而汉字以探究汉字如此发展的历史原因。二者互补互证,方能更好地认识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后出的形声字在秦汉时期就已成为汉字的主体,在7000现代汉语通用字中则多达81%²。形声字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原因,一直是汉字学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清初的戴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

书》中指出：“古字多假借，后人始增偏旁”，“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这一可贵的认识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后来人的重视。认为形声字的产生与发展是为了适应汉字向表音化发展需要的观点，反而一度成为主流。

向光忠先生在1985年提出了“形声字缘起增益形符示义说”，这是他由追踪“古今字”的衍化行迹而得以引发的。东汉郑玄笺注典籍所用“古今字”这一术语，尔后历代沿用而所指不尽相同。向先生通过深入考察而予以辨析界定：“在训诂学中，‘古今字’原指古今用字的相异现象；在文字学中，‘古今字’则指古今造字的相承关系。”进而立足于文字学，从大批古字加旁衍生为今字的现象入手来考察汉字的孳乳，发现形声之滥觞实为：“一则由于字义引申或假借而造成一形多义，为表意明确即增益形符加以区别；一则由于字形构造或字体演变而造成形晦义隐，为表意明显即增益形符加以显示。”正是由于古字的“形同义异”或“形晦义隐”而影响了交际，才增益形符而“以形别义”或“以形显义”，形声字遂由此生。向先生鲜明地指出：“形声缘起于‘增益形符示义’的孳乳字”，“早出的形声字之成因，不在表音，而在示意（别义或显义）”。他在推溯形声渊源的同时还考察了形声字的声符，指出：“声旁兼带示义者，乃是因含义引申而增殖的形声字或是因构形隐晦而增殖的形声字；声旁纯然表音者，则是由假借多用而增殖的形声字或是由产生新词而增殖的形声字。”向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汉字起源于以象记事的图画，进而发展为取象构形的表意字，但逐词象形造字的局限导致了有词无字矛盾的日渐尖锐，于是便大量借用已有的现成字以记录同音词，从而在书面语中涌现了大批的同形词。正如刘又辛先生所论，汉字的发展史上经历了

一个以表形字为基础以假借字为主体的阶段³。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面载体,字的增加总是以词的增加为动力的。一方面,汉语的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增加的新词主要是通过根词的引申成系列地裂变出来的,词汇系统总是要求新字能够反映新词衍生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假借的泛滥和字形的演变使汉字原有的具象性逐渐弱化,汉字体系迫切需要重建形义之间的对应联系以强化汉字的表意性。字少则假借,为音同而益类;义多要裂变,因义混以加旁。面对词汇发展与假借泛滥的尖锐矛盾,词汇系统与汉字体系协同作用而自我完善,“以类附声”的形声字就应运而生了。相承而生的形声字不仅能动地适应了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需要,而且更好地保持了汉字体系以形示义的历史传承性。它音义互补信息量大,以文组字能产性强,具有最优的整体功能。形声字因此由相承的“以类附声”而为直接的“形声相益”,很快发展成为汉字的主体,其结果是既分化了古字的兼职,又类化了汉字的字族。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早出的形声字之成因,不在表音,而在示意(别义或显义)。”

在古文字考释中,向光忠先生既属意于文字的形、音、义的内在联系,又瞩目于古文字、古汉语、古代史的紧密关系,注重汲取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成果与资料,运用现代语言文字学的理论与方法,坚持从“探明语词滋生规律,理清文字孳乳法则,联系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印证出土文献与传世经籍”来索解古文字。他力求避免:“谬于非许而标立异说;囿于揣形而任凭穿凿;悖于原理而滥言通假;疏于论证而妄作臆断。”这些学术准则,在他的具体研究中都有所体现。他在古文字讨源和探求语词滋生与文字孳乳时,即“追溯字词源流,从源相通、义相关、音相近、形相系中进行考察而作出论断”。在对甲骨文祀奉概称的祝文、珍供、牺牲之属

诸古文字的考释中,则结合殷祀文化来追溯祀奉字词的演化,并坚持用出土卜辞的辞例与传世文献的文例相参证。

汉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不仅是记录和承传中华文化的书面载体,是全体中华民族使用的交际工具,而且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中极富人文性的重要内容,全世界的华人都对汉字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文化认同。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加快与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势发展的今天,汉语汉字的研究不仅应与中国文化研究相结合,而且更要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服务。

无论是宏观讨论汉字体系,还是具体分析单个汉字,向光忠先生都注重从华夏文化和汉语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汉字,注重从汉字对汉语汉文化的能动适应中来研究汉字。他强调指出:是“汉族的社会历史,造成了汉字的特定背景;汉字的固有效功,推进了汉族的凝聚发展”,是“汉人的思维理路,促成了汉字的实象模拟;汉字的尚形原则,体现了汉人的表意理念”,是“汉语的词汇特点,制约了汉字的构造法则;汉字的内在性能,增强了汉语的构词活力”。他从宏观上探讨了汉字文化的生成机理,认为“汉字结体所潜蓄的华夏文化历史征迹之繁富斑斓是其他文字无可比拟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汉字是按义构形以形示义的表意文字。

1990年代兴起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热潮。随着研究的不断展开,向光忠先生开始了从实践到理论的思考。针对汉字、汉语的文化蕴涵时或为人混为一谈,他首先界定了汉字文化研究的内容范畴,指出不要把那些纯然的汉语文化现象误认为汉字文化现象。鉴于“汉字文化蕴涵涉及华夏文化历史的广阔领域与诸多层面”,他进而从“微观与宏观”、“狭义与广义”、“显性与隐性”、“静态与动态”、“内因与外因”等不同视角,深入讨论了汉

字文化的考察层面与研究方法。强调要在充分占有相关的传世古文献与出土古文物的基础上,通过对特定历史文化形态的多视角考察来探求汉字的构形理据,再通过对汉字文化蕴涵的发掘来更深入地认识远古的华夏文明。上述观点,在关于“盟”、“监”、“姓”、“氏”、“笔”、“墨”、“砚”、“纸”等字的文化阐释中都有具体体现。

在半个世纪的治学历程之中,向光忠先生不断求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研究汉字的一套基本方法。他把这些方法自我总结为四条治学路径:“一、融通语言与文化,蹑探隐索内蕴,不浮泛于文字之表层;二、贯通音韵与训诂,三位一体互求,不拘囿于文字之畛域;三、会通《说文》与铭契,参验印证互补,不偏执于文字之一隅;四、串通初文与孳乳,稽明繁衍轨迹,不滞目于文字之个体。”结合其论著来细心体会,向先生所说的“融通”、“贯通”、“会通”、“串通”这四个“通”,就是强调在汉字研究上要努力坚持四个结合:研究汉字要与研究汉语汉文化密切联系,研究汉字要综合音韵训诂以交相推求,研究汉字要重视传世《说文》与出土契铭的参验互证,研究汉字要注重从汉字体系的历史发展中去探究文字的孳乳,并进而努力从学术认识和研究方法上去“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不断提高汉字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向先生在汉字研究上的这些认识和探索是可贵的,其对于后学们的研究汉字更有意义。

向光忠先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有幸受业于王力、岑麒祥、魏建功、袁家骅、周祖谟等大家。后任教于南开大学,一直从事汉语汉字的研究与教学,至今已是整整半个世纪了。他学养深厚,视野开阔,早先侧重研究汉语史,继而致力于汉字学。即将出版的这部《文字学刍

论》，就是先生在汉字学研究上的一个学术总结，是一部很值得研读的汉字学专著。

龚嘉镇

2008年2月初

写于成都市

21世纪花园小区

附 注

1. 唐兰《谈谈文字学》，载《文字改革》1961年第10期。
2. 龚嘉镇《现行汉字形音关系研究》第7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第3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自序——涉学之曲径漫忆

在人生中，人世未必走在臆想的通道，为学或许离弃预想的方向。客观情势制约着主观欲念，主观愿望取决于客观因素。

自幼缘于家庭氛围熏陶，入学受到国文老师勉励，年少之时，即对文学发生兴趣，幻想长大成为作家。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志愿便是中文系，以为大学中文系就是文学家的摇篮。升入大学，出乎意料，却被分配学习语言学。当时不知语言学为何物，则大失所望。而在当年政治环境之中，却必须绝对服从分配，虽兴味索然，也无可奈何！

然而，人的兴趣，并非不可变易的；人的志向，亦非不可转移的。世界万象森罗，学术异彩纷呈，当视野由褊狭趋向开阔，当见闻由孤陋得以增广，新有所知则会新有所好。

20世纪50年代之初，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的文科与理科都归并于北京大学；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也合并到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增设语言学专业，成为全国唯一的语言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是王力教授从清华大学被借聘到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创办的，此时王力教授率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者们调职于北京大学，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原来的语言学者们荟萃一堂，则组成了雄厚的语言学师资力量，执行完善的教学计划，开展丰富的研究活动，呈现活跃的探讨局面，充满浓厚的学术气氛。在优越的条件下，新建的学科领域，丰实的学术内涵，博

识的授业良师,谨严的治学方法,对于学生,吸引强烈,影响深刻。基础课程让学生了解到语言学的基本知识,而名师开设的新课,其从事开拓性研究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则将学生带入更为高深的学术新天地,广开眼界,大长见识。教学科研实践表明,以人类社会之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显示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循逻辑思维之基本法则而分析论证其固有规律,体现出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学生受业一多,学习逐渐深入,认识趋于深化,对语言学便有了确切的了解。我的性格,不愿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进行重复的简单操作,而喜欢日新月异、日积月累、日引月长地从事创新的复杂劳动。在北大就读过程中,每日的学习,都会获取新知,从而心有所得,实际感受到《礼记·大学》之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此则体会到,研习语言学,会经常新有所获而持续求得上进的。在思维活动中,原先尝试文艺习作,曾对形象思维有所运用;而今体察语言学所采取的逻辑论证,则对抽象思维有所领悟。王力先生曾对我说:“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懂逻辑。教学计划本来列有逻辑学课,由于找不到好教师,就没有开课。你应该认真自学逻辑知识。”遵从王先生的教诲,我阅读逻辑学著作,则深感钻研语言科学而掌握思维规律之必要。于是,由原本对语言学之一无所知而逐渐体悟其内在奥秘,我便由先前之偏好文学而推及爱好语言学了,并决心毕生致力于语言学事业。

但是,社会背景主宰个人命途,上世纪中叶是一个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1957年春夏之交,大搞整风运动,针对鸣放热潮,狂风恶浪骤起,北大首当其冲,不少识微见几的学者,众多出类拔萃的学子,都惨遭迫害,戴上了“右派”帽子。连我这个平庸之辈,也受到冲击,被凶猛的风浪卷出了燕园,伴随诸多受发配

者，流落于社会底层。对于深居校园而尚未阅世的书生，这自然是难以承受的打击。我感到迷惘，绝望，竟以为此生休矣……垂头丧气，恍惚度日……而经过徘徊，思索，后顿然有所省悟：逆来顺受，意志消沉，荒废学殖，虚度年华，是十分可悲的。我想到了古语“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田子方》），觉得不宜悲观厌世，不学无术，无所作为，了却一生。从此原有的意愿便秘而不宣地复活于心中了。而这却并非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专心向学了，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钻研业务被斥之为“白专道路”。我只得躲躲闪闪，白天避开“左派”视线，夜间等到更深夜静，偷偷读专业书，悄悄写论著稿，手边则摆一本政治书刊作掩护。如此持之以恒，度过白昼黑夜，熬过严寒酷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1970年，我再次被放到郊区农村，走“五七”道路，接受再教育。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只能是利用间隙进行脑力活动。地头憩息，炕上歇乏，暗自翻翻书本，默然想想问题。而轮休数日回到市里，就集中精力运笔。未尝想到，劳动了两年多，区教育局长要我去给中学语文教师讲授语文专题，以提高其专业水平。这就给了我难得的机会，而以编写讲义之名，大大方方地撰写语言文字学术论稿了。如今，回首既往，历经坎坷，孤寂游离学界之外，蹒跚学路艰难而行，全然是出于对语言学的执著爱好。

1973年春，耳闻高校遭受“文革”劫难，师资不足，我几经踌躇，便前往南开园毛遂自荐。南开大学中文系经过审查，决定录用，负责人热忱向我表示：“即使超编，我们也要你。”曾经多次办理调动手续，结果，在当时的形势下，辗转周折，终未办成。事不遂意，并未使我感到凉水浇身，心灰意冷，我依旧沉浸于学。“文革”浩劫后，“四人帮”垮台，阴霾驱散，冰河解冻，处境刚好转的恩师王力先生与师母及唐作藩先生等，都关心我的境况，考虑我

的工作。王先生嘱托时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哲嗣秦似先生为我解决工作问题，秦似先生热心相助，责成有关单位积极办理。而后王先生又致函托付张清常先生，敦促南开再接纳我，南开中文系立即再上报，从速办理。而虑及南方办妥在先，我便准备携眷南行，南开却不让天津人事部门放人。其时，王先生偕师母随中央代表团赴广西参加自治区纪念活动，闻信特于旅次南宁宾馆赐函嘱咐：“北方的学术空气浓厚，有利于你的深造，我建议你还是到南开去，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师母也附笔叮咛。于是，遵循了一师与师母的指引，我便到南开园报到了。南开中文系根据工作需要，先安排我在现代汉语教研室，后调遣我到古代汉语教研室。而我之能立即适应，担任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自然是得益于就学北大中文系语言学专业而师从王力先生等师长所奠定的基础，也幸亏受挫折二十余年不曾自暴自弃，从未放弃所学专业知识和力求进益。自此，在恩师的关怀扶植下，我便有幸改变境遇，终于投身到学术行列，如愿投入了学术活动。

南开中文系经文革动乱而复归正常，由朱维之先生与邢公畹先生主持。临暑假前，邢公畹先生召我到寓所谈话：“南开中文系建立以来，一直没有开设文字学课，过去有位教师习《说文》，由于精神不大正常，没有讲过课。马汉麟先生对古文字有兴趣，可他也没讲过文字学。你说，中文系的学生不学文字学，行吗？”我答道：“知识面有欠缺吧！”邢先生接着说：“我打算开设文字学，而且定为必修课。你说有必要吗？”我说：“有必要。”邢先生说：“好！我今天约你来，就是要请你讲授文字学。你接受这个安排吧！”我说：“自量力不胜任。”邢先生说：“我认为你能胜任，才找你，这也是系的决定，还是应承吧！”我沉思片刻，只好说：“那就勉为其难，遵照您的指定，暂且承乏吧！”邢先生说：“中国

文字学内容丰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你就研究这门学问吧,我相信你会取得成绩的。”我说:“我尝试摸索一下吧!”邢先生说:“暑假后你就同时给两个年级讲课。”我说:“时间紧,来不及,我得先作准备呢!您还是按照教师开新课的惯例,先给一两年时间准备,或至少也给半年的准备时间吧!”邢先生说:“你就边准备边讲课吧,用不着一年半载的时间专门准备。”从此,我的学术之路,又转向新起点。

如何起步,反复琢磨:若仅着眼教学,那就只需做到:传授基础知识,完成基本任务。若欲提高要求,深化讲述内容,强化教学效果,启发独立思考,引发钻研兴趣,则宜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研究成果丰富教学活动,以教学实践引发研究意向,相辅而行,相得益彰。想到此,我决意研究与教学并行。通过实际研究,掌握经典理论,获取学术新知,形成妥实见解,辨识纰缪臆说,鉴别是非,判断优劣,秉持主见,决定取舍,然后用于教学。譬如,讲解文字构造方式,涉及“六书”理论,面对歧见异说,不致无所适从,而应有所决断,这就须要深入研究。再如,讲叙文字历史变迁,说明体式特点,揭示沿革行迹,串联一脉相传,这就须要考察文献资料,将古今文字比照研究;又如,讲析文字形义关系,援引许慎正确说解,匡正《说文》谬误训释,以甲骨文、金文等相检验,这就须要将许氏《说文》之学与殷周古文字学参酌研究。另如,讲述文字文化意象,充实讲授知识,引导拓宽视野,培养思辨能力,这就须要对文字所蕴涵的社会历史迹象进行研究。

基于上述认识,我重新研读业师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及其他相关论著,检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状况,对文字学的主要课题进行专题研究,未尝中辍,时有所得,撰著成编。

在学术生涯中,我引以为憾的是1957年遭劫从北大被发落而

远离了王力先生，不然，侍立师侧，耳提面命，驽才愚鲁也会学有长进的。而1979年《同源字典》书稿临刊行时进行校订，先生也曾亲笔致函南开中文系让我去从事辅助工作，相商未果，亦甚怅然！

回顾了崎岖的人生之路，我感念恩师王力先生与师母的厚爱与惠泽，也感念秦似先生、张清常先生、唐作藩先生的关怀与扶掖，亦感念邢公畹先生的器重与助勉。

我缅怀挚友——大姐、同学——师妹何乐士教授，我们相知有素，治学为人，彼此砥砺。她了解到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打算将拙著整理付梓，唯因琐务纠缠，分身乏术，迁延下来，她便一再催促我及早付印。到了本世纪之初，她见我仍在拖延，便背着我向出版单位推荐，以此鞭策。而复因著述中之古文字在电脑上处理费时，加之依旧不断有其他之事干扰，仍是时作时辍。未尝想到，在此期间，乐士竟溘然辞世！我哀戚之余，也为未能让她见到拙著面世而殊感遗憾。稽延至今终归刊印，则只能是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龚嘉镇教授黽勉于学术，好学深思，涵有学养，治学著有实绩。我们异地远离，原未谋面，而是神交。至本世纪初，才先后两次相晤于文字学研讨会，聚首短暂，亦未长谈。睽隔之中，书信往还，电话叙谈，相与切磋，有其见地。君见拙作，寻绎思路，言之中肯。拙著杀青，允为之序，深表谢忱。

商务印书馆周洪波、何宛屏、李青梅三位同志，幸蒙雅意，审酌拙著，纳入选题，安排出版，多劳费神，谨致谢意。

弁 首

王力先生关于中国文字学的识断*

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大师王力先生，既通晓西方新兴语言文字学的科学理论与先进方法，卓有成就地推动了我国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创新与拓展，也熟谙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历史沿革与丰硕成果，富有识见地促进了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继承与发展。这里试就亲炙领会之所及，评说王力先生关于中国文字学的精辟见解。

（一）中国文字学的优良传统与丰富遗产 之客观评价与批判继承

历时久长而积淀深厚的古代“小学”之延及后世，在学术界，不同学者偏执成见，曾经存在偏激倾向：

在对待遗产上，或无视传统，而滞目西学；或唯古是尚，而因循守旧。

在训释文字中，或妄自非许，而标新立异；或唯许是从，而瑜瑕莫辨。

王力先生针对两极偏向，坚持正确观点，采取求实态度，融汇新旧，贯通中西。既主张继承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优秀遗产，也